

“一万年来谁著史”

——历史长周期视角的中国经济变迁及其演进

管清友

(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处长、长策智库 GMEP 特约研究员)

本报告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GMEP)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GMEP是长策智库的研究项目之一。GMEP的宗旨是：立足中国的国家利益，依据中国的国际战略，及时深入的分析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关系的问题和地区国别，为政府决策和企业经营服务。GMEP的其他系列报告包括：《全球宏观经济快讯》、《GMEP工作论文系列》等。本报告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长策智库及作者所在单位的观点。未经GMEP授权，请勿发表、引用和传播。

“一万年来谁著史”

——历史长周期视角的中国经济变迁及其演进^①

管清友

(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处长、长策智库 GMEP 特约研究员)

1843 年，大清帝国道光二十三年，李鸿章遵父命赴京，意气风发，途中写下《入都》诗十首，其诗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广为传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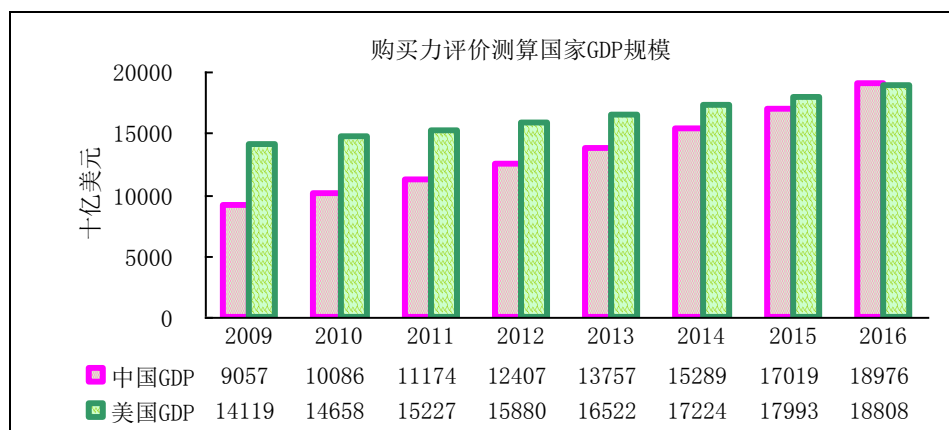
当时的清帝国，尽管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一，但已难掩颓势，落日余晖。李鸿章赴京的前一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大清帝国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被迫开埠通商，赔款 2100 万白银，割让香港岛给英国。李鸿章决心救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组淮军，平洪乱，剿捻匪，兴洋务，办外交，建海军。但甲午战败，声名狼藉；东南互保，做困兽之斗。观有清一代，李鸿章也算功勋卓著之重臣。然而，个人的才识无法阻止历史的滚滚洪流，李鸿章殚精竭力一生也没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终究也摆脱不了“大清裱糊匠”的命运。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称，“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去世后的这 110 年间，中国经历了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开始逐渐回归到她在世界上曾经的位置。2011 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接近 10%。

2011 年是平年，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2011 年 2 月 14 日，正值中国农历正月十二，日本公布了 2010 年 GDP 数据，日本 2010 名义 GDP 为 54742 亿美元，比中国少 4044 亿美元，中国正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终结了日本对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宝座长达 42 年的垄断。消息的公布给本已喜庆热闹的春节平添几分喧嚣，海外媒体纷纷发表评论和看法，感慨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国内反应倒是颇为平静。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两个月，一些机构已经把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缩短为 5 年。2011 年 4 月 11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 2011 年 4 月版《世界经济展望》，在 WEO 数据库中大胆预测，若按照购买力平价 (PPP) 估算，中国经济将于 2016 年超越美国。IMF 预测，到 2016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增加到 18.976 万亿美元，超出同期美国经济规模 0.168 万亿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到全球总量的 18%，届时美国经济占全球的份额将会萎缩到 17.7%。在下图中，IMF 用数据模拟了中国经济规模是怎样用五年时间从世界第二登上第一宝座。这一预测结果就像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再次触动海外媒体的神经。德国《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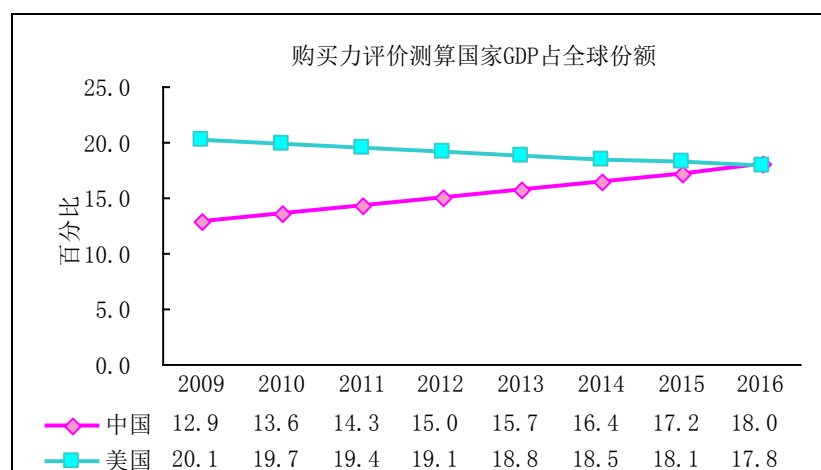
^① 本文节选自《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管清友 傅勇 程实 张明 著，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第十三章，略有改动。

代周报》说：人们将见证一场“扣人心弦的世界历史转折”；《华尔街日报》说，“我们正在见证美国经济霸权的终结”；甚至有外媒把 2016 年称为“中国世纪元年”。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1 Edition.

图 1 以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中国和美国 GDP 规模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1 Edition.

图 2 以购买力平价测算的中国和美国 GDP 占全球份额

国家之间经济总量的较量就好比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持续了千年，还在继续。还记得龟兔赛跑的故事，在持续千年的经济总量马拉松比赛中，中国就好比是骄傲的小兔，领跑千年便止步停歇，一觉醒来早已今非昔比，被“乌龟们”狠狠地甩在了后面。三十年前开始以加速度奋起直追，以短跑的方式长跑，以冲刺的爆发力提速，追赶上一个参赛选手。现在仅次于美国，重登第一的梦想也是指日可待。

面对中国的复兴，“中国威胁论”、“中国独秀论”、“中国崩溃论”等各种言论纷纷粉墨登场，言辞夸张。“捧杀”和“棒杀”的背后中国的真相究竟怎样？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近况如何？未来又将如何？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千年的马拉松比赛，中国几经沉浮。我感叹李鸿章之才，也为他的人生际遇悲哀，因此，选用他的《入都》诗句作为本文的题目，希望从一个历史长周期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变迁，并展望未来。今天，

我们站在过去通往未来的桥梁上，我希望我们能从历史中找到某些问题的答案。

一、中国经济在世界历史上的数千年辉煌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与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文明、爱琴海文明并称人类五大文明发源地。古代中国与古代巴比伦、古代埃及和古代印度并称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代中国第一个世袭王朝是距今四千多年的夏朝（公元前 21 世纪-公元前 16 世纪）。今天，我们很难通过比较经济规模去了解中国在公元前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但世界中心城市的转移却让我们窥一斑而知全豹。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与空间，中心城市的繁荣程度是反映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

表 1 带我们回到公元前 2000 年以来的世界城市规模排名，城市的人口规模虽然不能完全代表城市的经济情况，至少也通过聚集的人口反映城市的繁荣程度。这份几经转载获得的资料，可谓是历史跨度最长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排名。放眼望去，再熟悉不过的中国城市映入眼帘。尽管古时候世界的城市数量不多，但是要在全世界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排名三甲，也绝非易事。

从城市规模的排名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城市从公元前 1000 年开始进入前三甲，到 1850 年清朝没落时，北京仍位居榜眼。期间只有两次未有城市上榜，一次是公元前 430 年，当时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另一次是公元 361 年，匈奴攻占长安结束西晋时代。可以说，古中国的中心城市领先全球的记录保持了 2850 年，也反映了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辉煌历史。

从公元前 1000 年到公元 1850 年期间，中国榜上有名的城市，不仅是城市的人口规模大，而且几乎都可以称得上是“国际性大都市”。自两汉时期以来，长安是陆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从长安向东通往朝鲜；从长安向西，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直到欧洲。杭州也是历史悠久的贸易港，尤其是宋朝被迫南迁后将新都设在杭州，杭州的对外贸易发展兴旺。据史料记载，南宋时，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已达 50 多个，进出口商品已达几十种。自唐、宋以来，广州一直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根据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刊印的《南海志》中有关市舶的记载，当时与广州发生贸易关系的国象和地区，已达一百四十处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东起菲律宾诸岛，中经印尼诸岛、印度次大陆，直到波斯湾沿岸地区、阿拉伯半岛和非洲沿海地区^①。

表 1 公元前 2000——公元 1975 年部分时期
世界上最大的三座城市

时间	第一	第二	第三
----	----	----	----

^① 有关《南海志》的记载出自陈高华著的《元史研究论稿》中“元代的海外贸易”篇，中华书局 1991 年版，99 页。（原文载于《历史研究》1978 年第 3 期）

公元前 2000 年	乌尔	孟菲斯	底比斯
公元前 1600 年	阿瓦里斯	巴比伦	赛塔布尔
公元前 1200 年	孟菲斯	卡他斯萨斯	多尔库里加扎
公元前 1000 年	底比斯	西安	洛阳
公元前 800 年	底比斯	西安	洛阳
公元前 650 年	尼尼微	临淄	洛阳
公元前 430 年	巴比伦	叶西阿图	雅典
公元前 200 年	长安	巴特那	亚历山大里亚
公元 100 年	罗马	洛阳	塞琉西亚
公元 361 年	君士坦丁堡	泰西封	巴特那
公元 500 年	君士坦丁堡	泰西封	洛阳
公元 622 年	泰西封	长安	君士坦丁堡
公元 800 年	巴格达	长安	洛阳
公元 1000 年	科尔多瓦	开封	君士坦丁堡
公元 1200 年	杭州	非斯	开罗
公元 1350 年	杭州	北京	开罗
公元 1500 年	北京	毗阁耶拿伽罗	开罗
公元 1600 年	北京	君士坦丁堡	亚格拉
公元 1700 年	君士坦丁堡	江户	北京
公元 1800 年	北京	伦敦	广州
公元 1850 年	伦敦	北京	巴黎
公元 1900 年	伦敦	纽约	巴黎
公元 1950 年	纽约	伦敦	东京
公元 1975 年	东京	纽约	大阪

资料来源：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12 页，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原书引用坎德勒·特舍斯.《四千年城市发展史》（列维森，纽约：埃德温·米兰公司，1987）

表 2 中国重要历史时期

重要历史时期		重要历史时期	
公元前 2070 年——公元前 476 年 奴隶社会		公元（317——420）年	东晋
公元前（2070——1600）年	夏	公元（420——589）年	南北朝
公元前（1600——1046）年	商	公元（589——618）	隋
公元前（1046——771）年	西周	公元（618——907）年	唐
公元前 770 年	东周	公元（907——960）年	五代
公元前（770——476）年	春秋	公元（960——1127）年	北宋
公元前 475 年——公元 1840 年 封建社会		公元（1127——1276）年	南宋
公元前（475——221）年	战国	公元（1271——1368）年	元
公元前（221——206）年	秦	公元（1368——1644）年	明
公元前 202 年到公元 8 年	西汉	公元（1636——1911）年	清
公元（25——220）年	东汉	公元（1841——1949）年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公元（220——280）年	三国	公元（1912——1949）年	民国

公元（265——316）年	西晋	公元 1949 年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

资料来源：夏征农等. 辞海，附录（中国历史纪年表），5877-5937 页. 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年版。

通过对世界主要地区的人口、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在公元 1——1000 年间的变化作对比，可以看出，在公元纪元的一个千年里，世界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主要集中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东方古国。在这一千年里，中国几乎没有实现人口的增长，经济总量的扩张微乎其微，人均收入水平也没有很大变化。美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证实，从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罗马帝国衰落之前，中国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于欧洲。但是到了公元 1000 年，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欧洲的收入水平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当时较为繁荣的几个国家在这一千年里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衰退，意大利和希腊无论是人口、经济规模还是经济水平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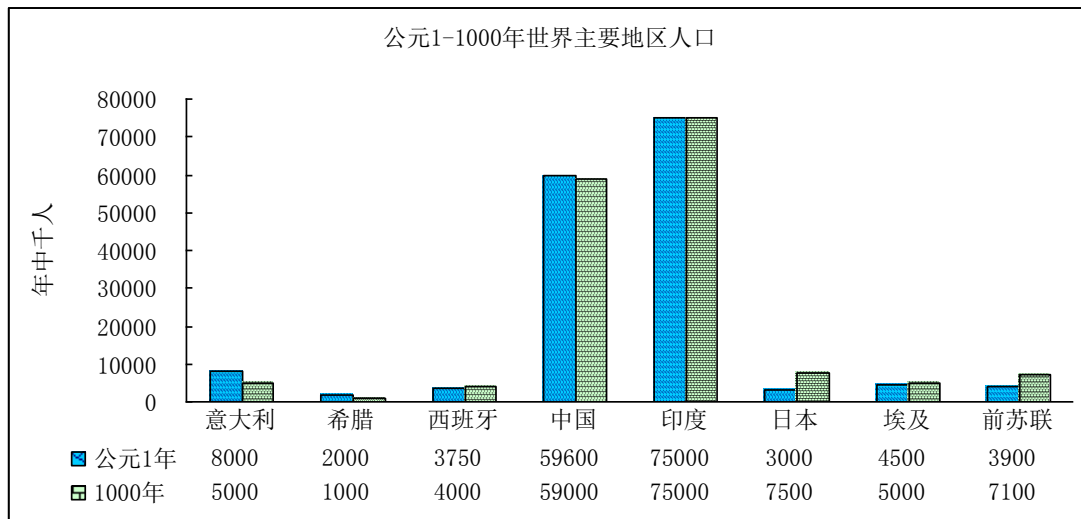


图 3 公元 1-1000 年世界主要地区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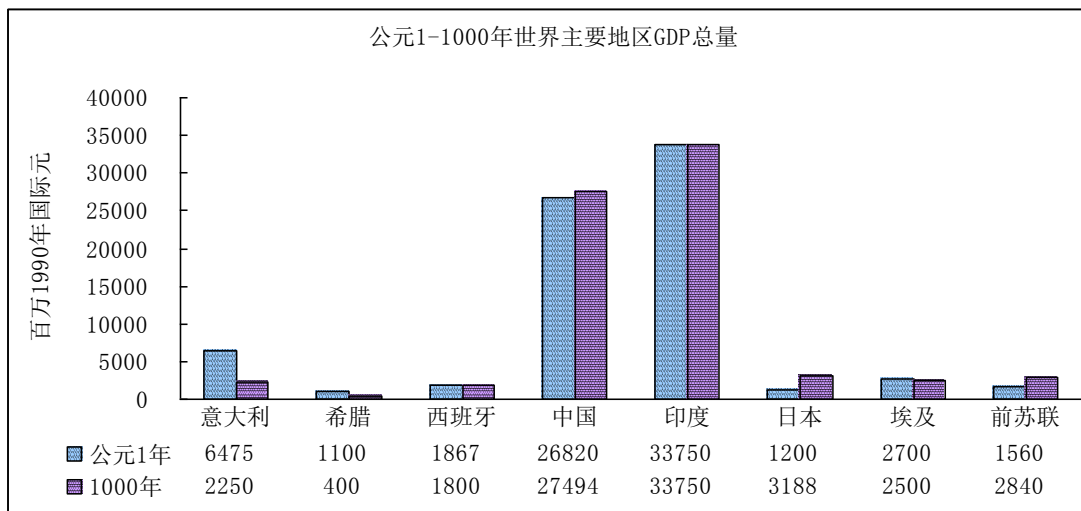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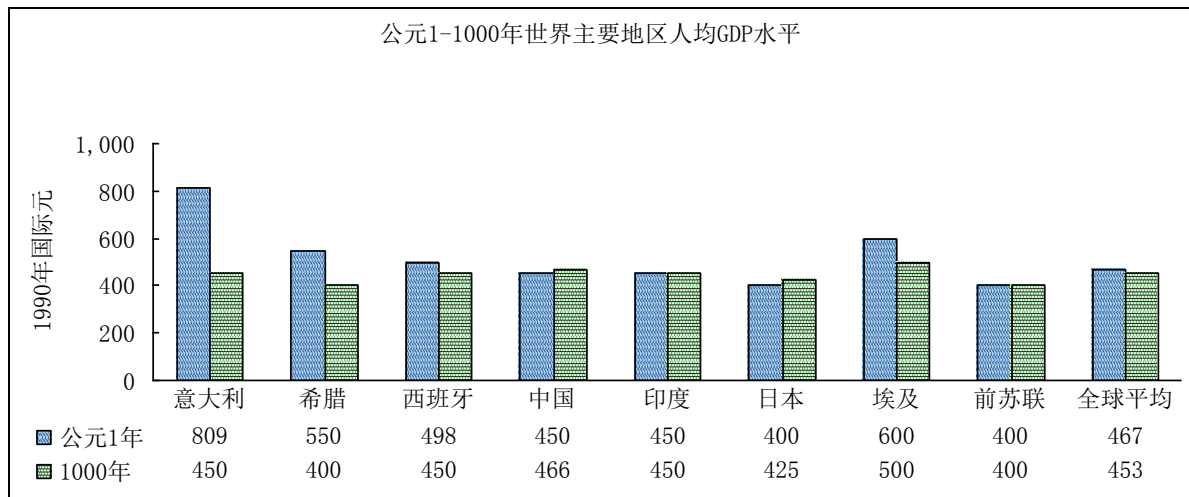


图 4 公元 1-1000 年世界主要地区 GDP 总量



注：印度是分治前的印度，是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之和。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6 AD (Copyright Angus Maddison)

图 5 公元 1-1000 年世界主要地区人均 GDP 水平

二、大分流：晚明以来的经济停滞和衰退

许多历史研究表明，公元 1000 年以来，也就是宋朝时期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繁荣发展的阶段。麦迪森对公元纪元的第二个千年中国的经济表现做出如下评价：早在公元 10 世纪，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延续至 15 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对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在此后的 3 个世纪中，欧洲才在人均收入、技术和科学能力上逐渐超过了中国。到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上半叶，当世界经济明显加速增长之际，中国却衰退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历史与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其代表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指出，18 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文也作“大分岔”）。彭慕兰认为，美洲新大陆的开发和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是西方世界兴起的重要原因。还有很多学者从货币流动、产权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偶然因素导致的路径依赖等方面去解释“大分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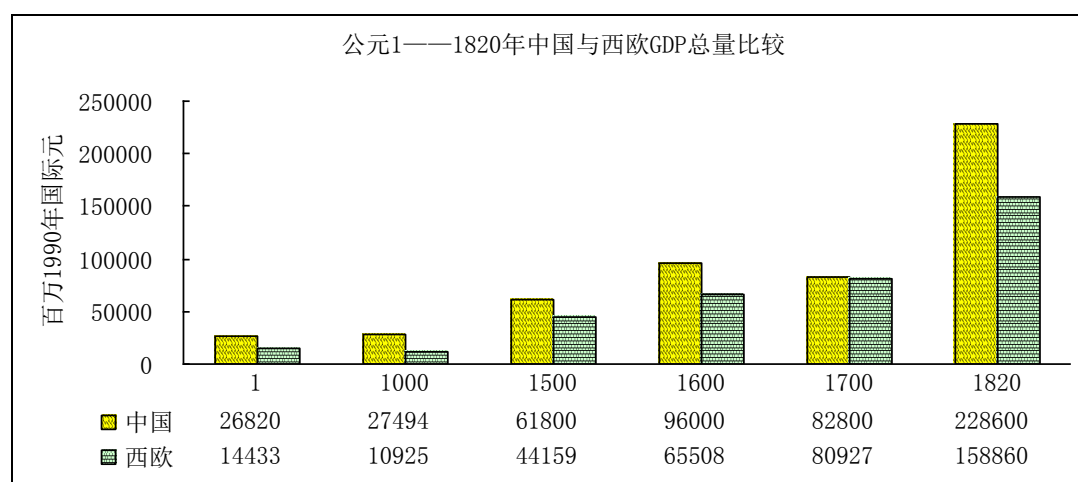
德国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G·Frank）在其代表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也指出，五千年的世界体系中心是亚洲不是欧洲，而中国则是亚洲的核心。古代中国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是晚明时期起以白银取代纸钞，确立银本位的货币体系^①。在银本位时代，巨大的白银内需拉动了外银流入，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生产的白银，有一半流

^① 万历九年（1581 年），一代明相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赋役改革，将历朝历代主要以实物征缴的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折成银两缴纳，确立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古代中国进入银本位制时代。

向了中国。由于中国的白银货币供给严重依赖进口，封建王朝政府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能力大为削减。到十七世纪时，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世界白银供应突然匮乏，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后来才又因为经济发达、人口过剩而抑制了生产技术的革新，并出现了两极分化等社会危机。欧洲逐渐崛起，而中国却江河日下。崛起的欧洲，又通过战争的方式从中国把白银抢走。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 Needham）在其编著的 15 卷《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冶金学和造纸术领域领先西欧上千年，而印刷术也领先西欧七百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火药这一中国的伟大发明将西欧诸国的封建骑士社会炸得粉碎，指南针给西欧的外探险家们指明了方向，为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立下汗马功劳。有学者提出，“在 14 世纪中叶，当时位居世界头号强国的中华帝国无论在科技水平还是教育和资本积累方面都达到了西欧工业革命前夕的程度。事实上，催生西欧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基本上全都来自中国”^①。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斯（D. North）认为，正是产权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有效保障有形产权和无形产权，激励了智力投资和生产发明。在工业革命时期，西欧的发明家大量涌现，推动技术创新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诺斯认为，产权制度创新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充分条件，而这一前提恰好被古代中国所遗漏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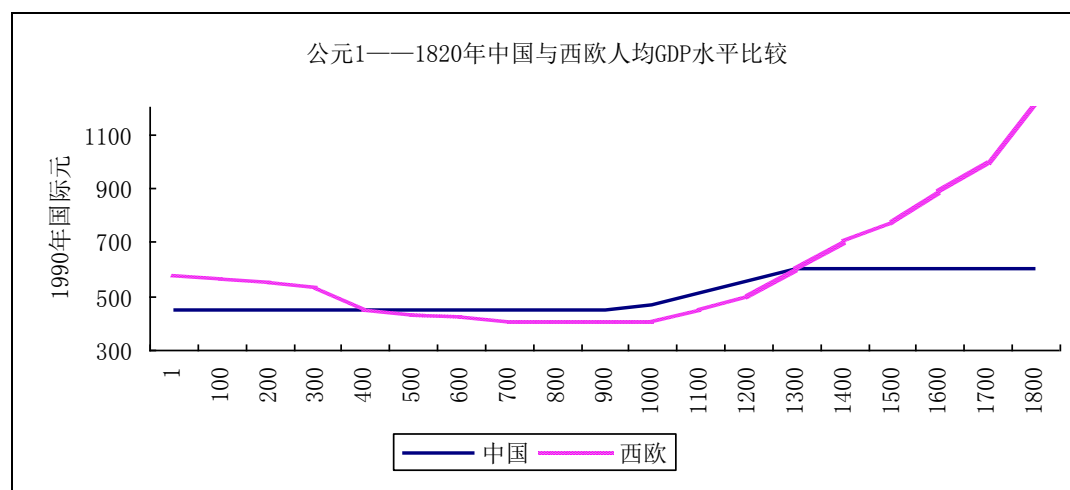
还有一种观点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有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抑制了科技的发展，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主流文化过分强调道德修养而轻视科学发明，同时传统文化思想束缚个人的创造力，不利于科学创新的发展。在大家热火朝天的讨论中西方“大分流”的原因时，也有声音认为，发生在西欧的工业革命不是一种规律性的历史进化结果，这一切都是偶然现象导致的不同结果。与其说工业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还不如说它只是一种十分偶然的现象。千年文明古国的兴盛视为历史的常态，而西方的兴起却需要特别解释。



① 蒲勇健：《来自诺斯的启示》，《知识经济》2001 年第 1 期：53-55。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6 AD (Copyright Angus Maddison)

图6 公元1-1820年中国与西欧GDP总量比较



注: 部分年份数据缺失, 根据趋势估算填充, 因此算是趋势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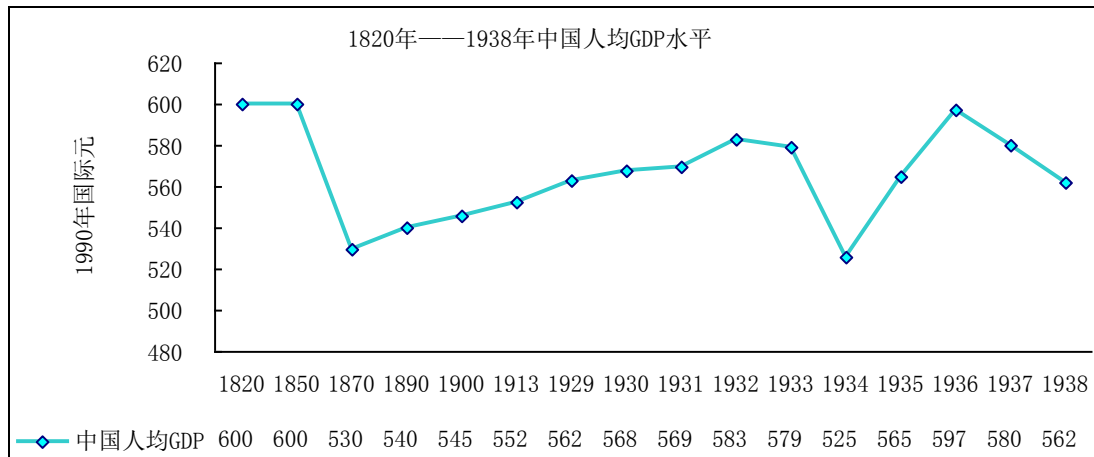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6 AD (Copyright Angus Maddison)

图7 公元1-1820年中国与西欧人均GDP水平比较

从经济规模来看,从公元1—1820年,中国始终高于西欧,但是从人均GDP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呈现一条缓慢上升的曲线。在公元4世纪—13世纪,中国的发展水平高于西欧。从14世纪时起一直到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经济水平停滞不前。而西欧在这段时期的经济表现则更为积极。西欧的人均GDP在公元10世纪左右处于谷底,由于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整体经济崩溃,其经济水平明显低于公元一世纪时。但是经过漫长的复兴,14世纪时,西欧的人均GDP水平超过了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在西欧各国陆续开辟通往美洲和亚洲贸易通道的时期,在明朝和清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海洋外交的绝唱,与西方的国际贸易和知识交流日益萎缩,这种固步自封的国际孤立阻碍了经济增长。麦迪森对此评论道:“这一决定使中国隔绝于15世纪以来世界上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扩张,而这一扩张正是策划能够为资本主义企业在欧洲得以迅速发展一个关键因素”。

尽管解释“大分流”并非本文的任务,但每念及此,不免为中国丧失机会,停滞不前而感到追悔和悲哀。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清朝还沉浸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这一时期被史学家成为“落日的辉煌”。到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时,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家,而清朝政府内忧外患,积重难返,江河日下。从中国人均GDP的长期趋势来看,1820年到解放前,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一直在1820年的水平之下,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停滞,而且步入衰退。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纷纷加入工

业革命的行列，到 19 世纪末，这些国家先后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了“日不落帝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实力大为增强。



资料来源：麦迪森. 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 960——2030）.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68 页。

图 8 1820 年—1938 年中国人均 GDP 水平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大大增加，产品数量也大大增加，中国成为英国理想的商品倾销地。由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奢侈品在欧洲市场十分受欢迎，造成英国贸易逆差。为了获得贸易收益，英国商人通过走私鸦片到中国以支付茶叶及其他中国商品。鸦片对经济社会的危害日趋严重，1839 年清朝政府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也就是“虎门销烟”事件。这件事情成为了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从鸦片战争开始，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割地赔款拉开了外国侵略者瓜分中国的序幕，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屈辱时代。据资料统计，从 1841 年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 108 年间，中国对外先后订立了 1175 项条约^①，在这 1175 项条约中，有几百项不平等条约，表 3 列举的仅仅是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几十项不平等条约。

表 3 满清重要不平等条约一览表

签署年份	和约	签署国
1841 年 5 月 27 日	广州和约	中英
1842 年 8 月 29 日	南京条约	中英
1843 年 7 月 22 日	南京条约补充条款	中英
1843 年 10 月 8 日	虎门条约	中英
1844 年 7 月 3 日	望厦条约	中美
1844 年 10 月 24 日	黄埔条约	中法

^① 高放. 近现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来龙去脉[M]. 南京社会科学, 1999 (2): 18-28. 该文中指出王铁崖教授所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列入该书目录的条约，共计 1182 件，其中除最初 7 件订于 17、18 世纪外，其余均为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所订立。

1858年5月28日	璦琿条约	中俄
1858年6月13日	天津条约	中俄
1858年6月18日	天津条约	中美
1858年6月26日	天津条约	中英
1858年6月27日	天津条约	中法
1858年11月8日	天津条约补充	中英
1860年10月24日	北京条约	中英
1860年10月25日	北京条约	中法
1860年11月4日	北京条约	中俄
1864年10月7日	勘分西北界约记	中俄
1868年7月28日	增续条约	中美
1869年10月23日	新修条约普后章程	中英
1871年8月13日	修好条约	中日
1874年10月31日	北京条约	中日
1876年9月13日	烟台条约	中英
1879年10月2日	里瓦几亚条约	中俄
1881年2月24日	伊犁条约	中俄
1884年5月11日	会议简明条款	中法
1885年4月18日	天津条约	中日
1885年6月9日	新约	中法
1885年6月10日	烟台条约	中英
1887年12月1日	北京条约	中葡
1890年3月17日	印藏条约	中英
1894年3月7日	华工条约	中美
1895年4月17日	马关条约	中日
1895年11月8日	辽南条约	中日
1896年3月6日	胶澳租借条约	中德
1896年6月3日	密约	中俄
1898年6月9日	展拓香港界址条约	中英
1901年9月7日	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
1904年9月7日	续定印藏条约	中英
1905年12月22日	满洲善后协约	中日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下）编纂委员会编. 上海辞典出版社，1992年版，110-136.

表4 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的地位

年份	中国经济规模占全球比重	国家排名	第一名国家
1	25.4%	3	意大利
1000	22.7%	2	印度
1500	24.9%	1	中国
1600	29.0%	1	中国
1700	22.3%	2	印度
1820	33.0%	1	中国

1870	17.1%	1	中国
1900	11.1%	2	美国
1913	8.8%	2	美国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6 AD (Copyright Angus Maddison)

尽管从 1840 年开始中国遭受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战争的破坏，中国的 GDP 仍居世界前列。表 4 梳理了从公元 1 年——公元 1913 年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的地位，从表中可见，在 19 世纪中国的经济总量仍位居世界第一，直到 20 世纪初才退居第二。从经济总量来看，在封建王朝没落时，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大国。

然而，经济总量大国并不一定是经济强国。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大国的兴衰》提供的数据表明，到 1860 年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 20 年左右时，英国的生铁产量占世界的 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 50%，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全世界的 40%~50%，人均工业化水平是中国的 15 倍。财经作家高连奎在其《中国大形势》中证实，1861 年至 1894 年间开展的洋务运动赶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采煤、炼钢、铁路、火车、轮船、纺织等产业基本上赶上了西方国家水平。而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初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的再次飞跃发展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连年战乱的中国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在西方列强掀起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后，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为增强，生产能力的扩张急需在世界范围内开拓更为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促使其加紧推行殖民政策。19 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



图 9 法国明信片上列强瓜分中国的漫画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腐朽没落，中国的白银如潮水般外涌，清朝政府不仅花费大笔军费，并且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些都加重了对普通百姓的盘剥。清政府的捐税，年年增加，加之外国廉价工业品冲击传统家庭手工业，使得广大人民失去生计甚至陷入绝境。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地爆发反清反帝武装起义，清朝统治集团也逐渐意识到可以“借洋助剿”，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洋务运动由此兴起。

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洋务运动开拓了一代学习西方知识的好风气，在国家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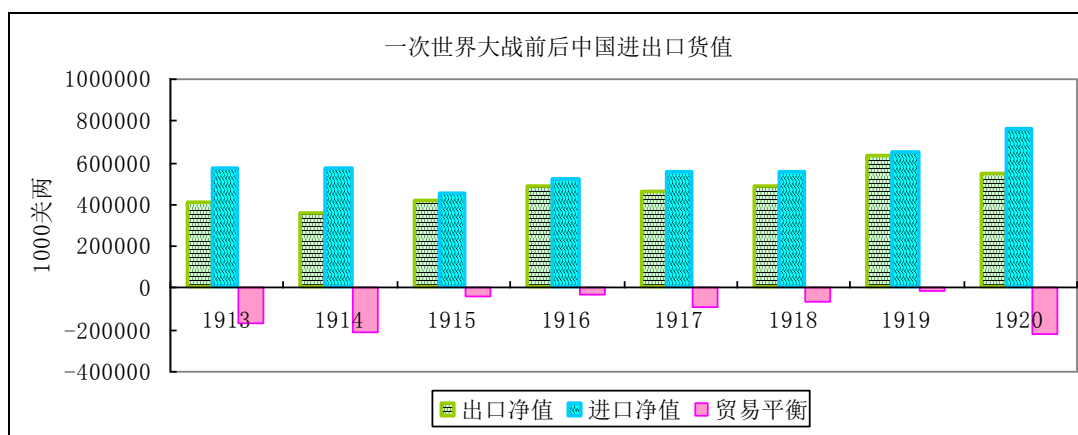
力的推进下，完成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洋务运动一开始就注定其失败之命运。晚清时期汉族官僚集团以国家垄断的手段求富求强，结果导致经济上出现严重的国进民退，使得救亡图存之路误入歧途，也无法逃脱失败的结局。在“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中法战争中，取得中法战争的“不败”可谓是洋务运动多年努力的成果，但是“败”也暴露出洋务运动的政治弊端。

尽管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但是有识之士寻找强国之路的努力没有停止。戊戌变法是晚清改革派挽救民族危机的又一次尝试，标志着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转变。可惜新政从颁布之日到变法失败，历时 103 天，史称“百日维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是晚清的有识之士为救国图强向西方寻找道路的重要探索，从西方引进先进科技和思想观念，都有着共同的弊端，就是不触动专制统治的根基，因而无论是自强运动还是改良主义都难以完成使命，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戊戌政变分别给两者划上遗憾的句号。至此，改良主义被抛弃，救亡图存者被逼上革命道路。中国的爱国志士彻底认清，要结束满清专制统治，要想改变中国命运，只有革命一途。

三、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艰难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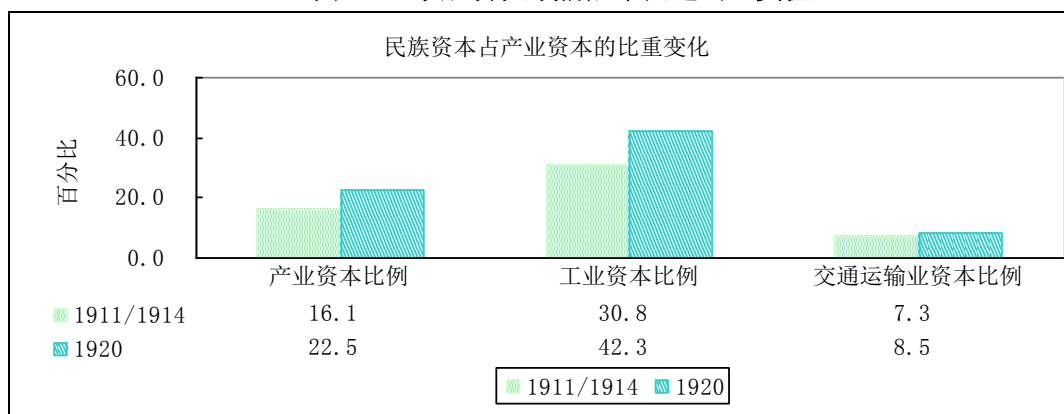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开创了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但权力旋即转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之手，其统治中国长达 16 年。辛亥革命之后，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成为政治主流。北洋政府解除了民间兴办企业的限制，鼓励私人创办实业，在程度上为资产阶级发展经济扫除了障碍，奏响了私人资本工业发展的序曲。

1914—1921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几年，中国工业获得了近代最为显著的增长，资产阶级在中国大地上热火朝天地发展民族经济，企业利润极为丰厚，被誉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14 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环境。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纷纷被卷入战争漩涡，生产能力都集中在军火生产，而无暇顾及民用商品的生产，无力向中国倾销大量商品。相反，交战各国因战争需要反要增加民用工业品与军需物资的进口，中国的出口随之急剧增长。国内持续不断提倡国货抵制外货运动，广大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争购国货，抵制洋货，为开拓国货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给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打开了一丝“夹缝”，正是这一线生机，成就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数据来源：郑友揆.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 年)——史实的综合分析[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年，336-337 页。

图 10 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进出口货值



数据来源：吴承明. 近代中国资本集成和工农业与交通运输业总产值的估计[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4)：23-26。

注：图中数据根据文章整理计算得出。尊重原文安排，1911/1914 沿用文章格式，外国资本为 1914 年，官僚资本为 1911 年，民族资本为 1913 年，故以 1911/1914 表示。

图 11 1911—1920 年民族资本占产业资本的比重变化

表 5 1913—1921 年私人资本工业各部门资本额增长情况比较 单位：万元

	1913 年	1921 年	增长量	发展速度%	年均增长率%
棉纺织业	1423	9842	8419	691.64	73.95
面粉业	885	3257	2372	368.02	33.50
缫丝业	1603	2253	650	140.55	5.07
卷烟业	138	1680	1542	1217.39	139.67
水泥业	285	880	595	308.77	26.10
火柴业	294	746	452	253.74	19.22

数据来源：黄逸平、虞宝棠. 北洋政府时期经济.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年版：114 页。

关于“黄金时期”之后的工业发展情况众说纷纭。一种观点认为，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暇东顾的欧洲列强在战后卷土重来，中国民族工业连一丝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恢复昔

日受到压迫的状态。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初,就有人提出这一版本,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已到山穷水尽之地步。”^①另一种观点认为,1419-1929 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可称之为充分发展时期”,在 1929 年以后才“陷于凋敝之境”。^②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内经济史学界普遍认为,1922 年以后“中国民族工业就永久结束了暂时繁荣而陷入长期萧条”。^③但是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教授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私人资本工业在整个 1920 年代还是有所发展的,萧条和危机仅发生在 1922-1924 年的某些行业中,其它行业仍有发展。^④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相比大战时期及战后初期,西方列强对中国市场的掠夺确实是变本加厉,民族工业企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1925 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掀起了抵制洋货的怒潮,大大减轻了外资企业对民族工业的排挤和压力。可以说,这一阶段民族工业虽然没有“黄金时期”繁荣,但是民族工业还在继续发展。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次年于名义上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南京国民政府也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于建国后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直到 1937 年被日本发起全面侵华战争所中断,称为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尽管国民政府时期,仍是战乱频繁,“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但 1927-1936 年间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变化巨大,十年“黄金时代”的现代化建设卓有成效。资料显示,1931-1936 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 9.3%,可谓是经济增长奇迹。1935 年至 1937 年,国内工商业以 20%左右的增长率高速发展,1936 年 1 月甚至出现了空前的几百万美元的贸易顺差。1927-1937 年间,中国的公路通车里程从 3.2 万公里增长到 11.6 万公里,新建成铁路 7895 公里。^⑤1937 年,全国银行存款总数将近 40 亿元,比 1931 年增加了近一倍。^⑥社会生活的变化也令人耳目一新,在许多大城市,现代风格的大楼、密如织网的大道、系统遍布的水电供应、明显改善的环境卫生,以及电影、汽车、收音机、卷烟、西餐、西服等,林林总总,莫不透露着现代化的气息^⑦。

可惜“黄金十年”生不逢时,赶上了史上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经济衰退——“大萧条”。1929 年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随即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场经济危机虽然没有在中国发生,但是对中国民族工业产生了极为致命的影响。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列强为转嫁经济危机,一方面,援引不平等条约向中国输入资本,纷纷在华设厂,企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加紧向中国市场倾销商品。从 1930 年到 1936 年呈现增长趋势 1930 年西方列强对华投资额为 34.87 亿美元,1936 年增长到 42.85 亿美元^⑧。另一方面,各国奉行“各自求生”,“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民族工业企业出口困难。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原本就

①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第 113、118 页。

② 朱斯煌:《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学会 1948 年,第 249、254、256 页。

③ 于素云:《中国近代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270 页。

④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334-336 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5)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70 页。

⑥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447 页。

⑦ 秦正为.萌动与选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走向[M].党的文献,2010(4):51-55.

⑧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52 页。

处于幼稚期的民族工业无法与成熟的外资企业相抗衡，很多民族企业陷入窘境，奄奄一息。为了提升与外国资本的竞争能力，民族资产阶级通过兼并、联营等活动，不断集中和扩展产业资本，积蓄民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力量。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的挣扎最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敌不过官僚资本主义以国家资本进行产业垄断。抗战开始后，为抗战之需，国民政府加强了资源委员会的权力，利用政治特权强行集中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将中国经济推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轨道。

近现代的中国，无论是北洋政府的“黄金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黄金十年”，中国的经济建设虽是略有长进，但经济基本面满目“硬伤”，金融风暴频发，恶性通胀失控。金融史学家洪葭管先生曾总结在近代历史上，旧中国金融风暴就有十次之多。1866 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因世界棉业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潮、1883 年因倒账严重爆发的金融风潮、1897 年因高息揽存酿成的贴票风潮、1910 年橡皮股票风潮、1911 年因清朝灭亡政局变更票号集中倒闭、1916 年中交停兑风潮、1921 年信交风潮、1934—1935 年白银风潮、1947 年黄金风潮和 1948—1949 年的法币、金圆券崩溃危机。^①而发生在解放前国统区的恶性通胀是 20 世纪出现过的两次最为著名的恶性通胀^②，1949 年解放前国统区金圆券的发行量折合法币高达 2,038,374,000,000 亿元，上海的物价总指数由 1937 年 6 月的 100 上升为 $36,366 \times 10^{11}$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国东部地区工业重地和金融中心步步沦陷；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内战一打又是四年，“黄金时期”和“黄金十年”苦心经营的经济成果统统化作炮灰，新中国是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国家。

四、新中国经济六十年

计划经济的三十年，是国家严格管制经济的三十年，是有政府无市场的三十年。新中国建立初期，工业和基础产业极端落后，又受到长年战争的持续破坏，社会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国内物资匮乏，国际贸易封锁，加之自抗日战争以来的恶性通胀，经济十分脆弱。从 1949 年 4 月到 1950 年 2 月，连续发生四次大规模的涨价风潮。政府通过统一全国货币，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等财政金融手段，一举平抑市场物价，结束了长达 12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52 年底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在这短短三年间得到迅速恢复。从 1953 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为期五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开展经济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6 年，我国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任务，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957 年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所制定的各项经济任务。

① 洪葭管.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中国近代金融风潮谈金融危机[N]. 上海金融报, 2008 年 7 月 21 日。

② 另一次则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这两次通货膨胀都被作为恶性通货膨胀的典型例子载入史册。1923 年德国的纸币马克流通量达到 496×10^{18} 的天文数字，价格指数由 1922 年 1 月的 100 上升到 1923 年 11 月的 10^{13} 。贺水金：论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与成因[M]. 上海经济研究 1999(06). 67-71.

1958年，在“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指引下，“大跃进”由一场荒唐的闹剧演变成了一场历史悲剧。从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60年总人口净减1000万，1961年又净减348万，这1348万仅仅是公布的总人口的净减数字，尚未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据权威资料显示，在长达12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2100万^①。很多研究估计了大饥荒时期的人口大缺口，最低限也在1000万。“超英赶美”的大跃进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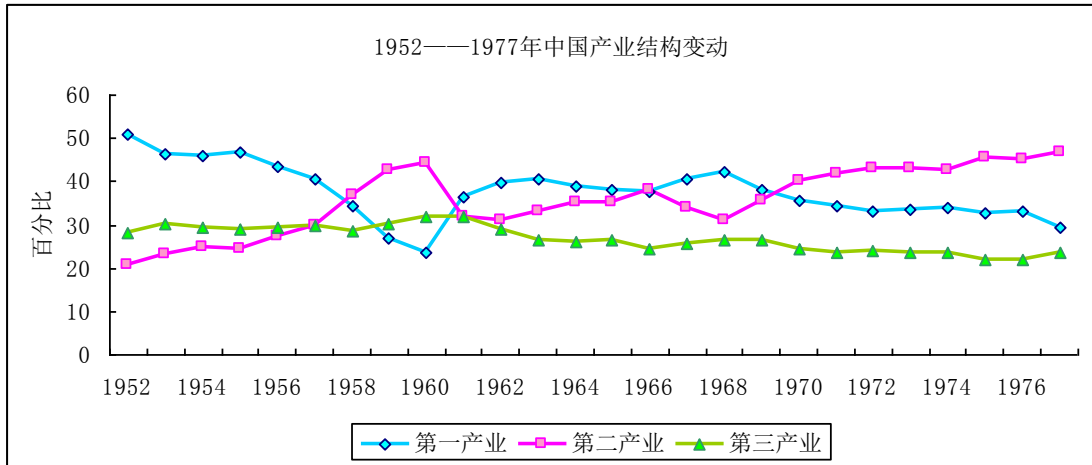
国民经济尚未得到喘息，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十年浩劫”，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干扰和破坏。在长时间的内乱中，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改善，文化建设不进反退。十年文革对经济的损害远不及对文化教育界的破坏，这场动乱迫害了很多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而本该在校园接受教育的青少年都把青春年华浪费在具有极大破坏性的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中，使得文革之后的许多年，我国在文化科技等知识领域的断层和缺口一直未能填补，影响极为深远。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期间进行了中美朝鲜战争和中印边境战争，与美苏先后处于敌对关系，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大规模的禁运，我国在国际上处境十分孤立。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种自我残害式的冒险试验，所造成的创伤使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几近崩溃^②。

在“赶超战略”的驱使下，新中国成立后，国内集中有限的生产资源，重点投向工业部门，苏联对我国工业建设提供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采取了重化工业起步的超常规道路，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195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当年农业和工业产值的比重为34.4：37.0。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终止对我国工业的援助，使得大批工业投资项目半途而废，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44.5%骤降到1961年31.9%。苏联撤走大批专家，留下一个基础工业的烂摊子，中国人开始自力更生地大搞工业建设。尽管有十年动乱的严重干扰，国民经济不时偏离正轨，工业经济发展历经大起大落，但我国终于成功地构造了相对独立、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步入了工业化初级阶段，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工业基础。

^①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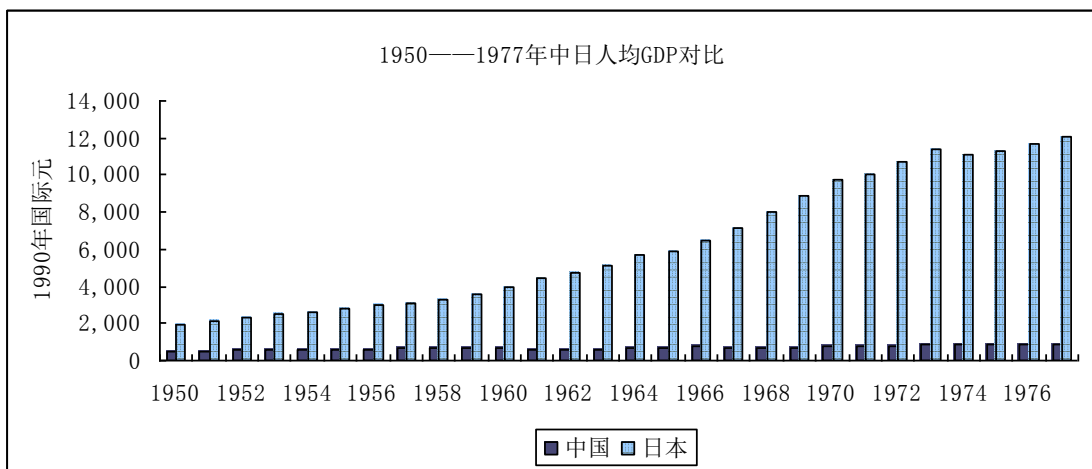
^② 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描述选自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公元960—2030年》第二版中的生动评价，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全国篇，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年版。

图 12 1952—1977 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

尽管代价极大，但计划经济三十年，中国从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工业体系和国民体系较为完备的工业国。1977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 1952 年的 4.74 倍，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1977 年的人均 GDP 是 25 年前的 2.86 倍。但是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浪潮来看，二战后国际局势趋向缓和，正是经济发展绝佳的时间窗口，以日本为首的其他东亚国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经济起飞，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东亚奇迹”。二战之后，日本只用了 7 年的时间，经济水平就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用了 25 年的时间，就登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把同样在废墟上重建的中国远远甩在身后（见图 13）。中国却游离于国际边缘，与世界经济发展相脱节，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破坏，使得中国错失一次又一次宝贵的经济发展机遇。中国不仅没有实现“超英赶美”的梦想，追赶发达国家的路程反而变得更加遥远。



数据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6 AD (Copyright Ang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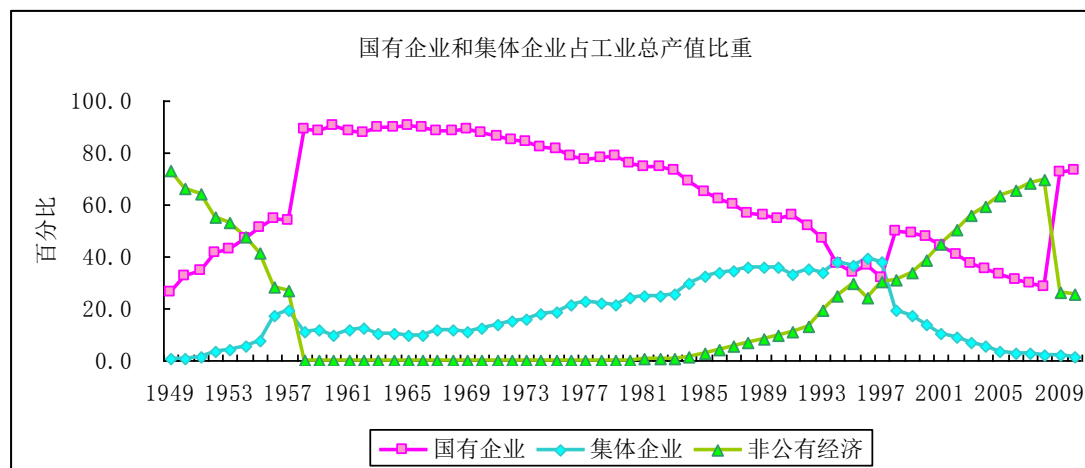
Maddison)

图 13 1950——1977 年中日人均 GDP 对比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国家放松管制的三十年，是政府权力逐步退出市场的三十年。文革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财政负债累累，人民生活处于贫困水平。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是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转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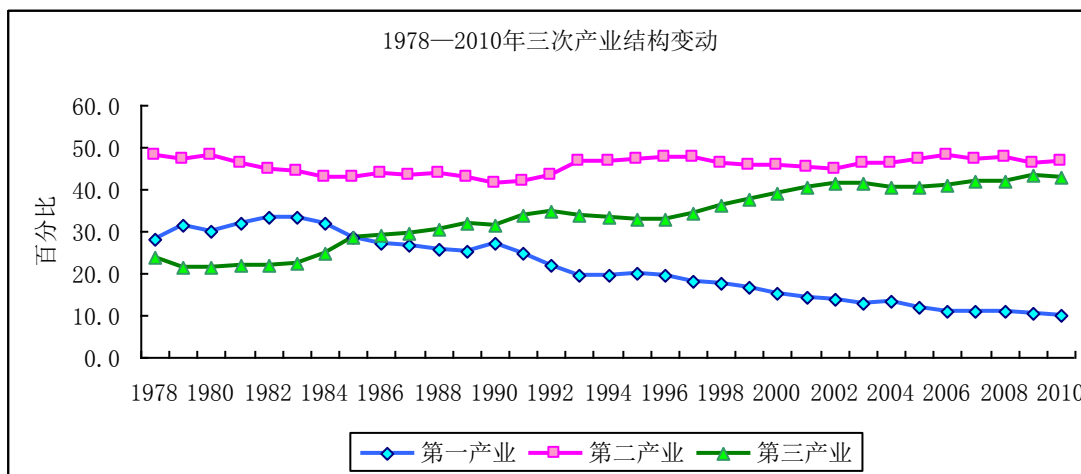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回潮期。第一次发生在 19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经济改革遇到困难，并爆发学生运动，改革开放面临全面回潮。邓小平南巡讲话奠定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基调，成为 20 世纪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随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面临重大抉择之时又被拉上了正确的轨道。

1990 年代以来，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曾经一度辉煌的集体企业每况愈下，原来的“集体企业”或是退出市场舞台，或是改成股份制企业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到 2010 年仅剩下 0.92 万个集体企业。21 世纪以来，非公有经济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大大高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第三产业也走出受到抑制的状态，迅速发展起来。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23.9%持续上升到 43.0%。



数据来源：2009 年以前的数据来自《新中国 60 年统计汇编》全国篇，2009 和 2010 年数据来自 CEIC 中国经济数据库。

图 14 建国以来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工业总产值结构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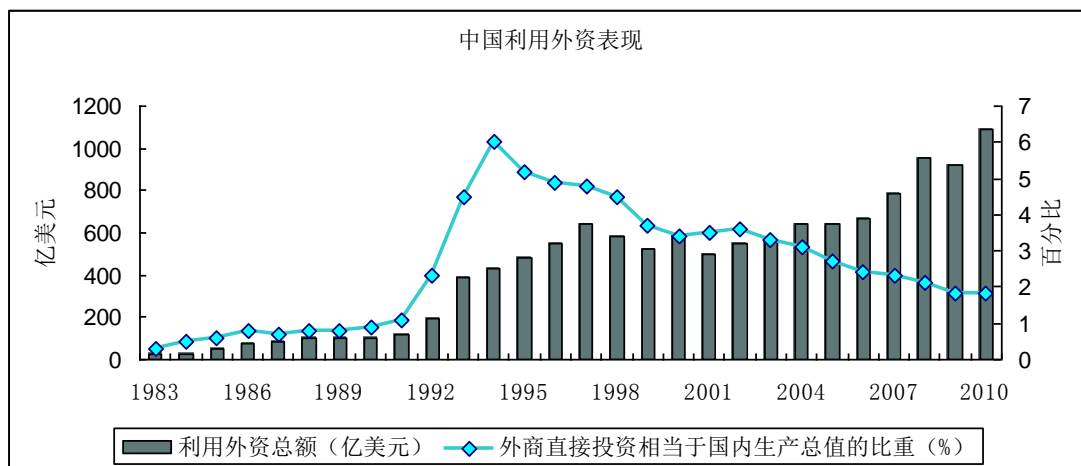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0》，2010 年数据来自《2011 年中国统计摘要》。

图 15 1978——2010 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动

第二次回潮期发生在 21 世纪最初几年。企业改革是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复杂而激烈的过程。中共十七大前后，一些学者对国企改革方向提出全面质疑，并最终演变为对“要不要改革”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由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了诸多社会问题，引起一些社会阶层的强烈不满，一些人甚至公开反对继续推行改革开放。而辩论双方都扛起改革大旗反对对方。这一争论以最高层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表态而告一段落。但此后，关于改革争论从未停止。

三十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扣除通胀因素，从 1978 年到 2010 年 GDP 实际增长了 20.6 倍，平均每年增长 9.9%；人均 GDP 增长了 14.7 倍，平均每年增长 8.8%。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并非是全球经济的起飞阶段，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许多。但是中国抓住了三次重要的外部机会，曾经“超英赶美”的梦想看似遥不可及，转瞬间到 2010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

第一次机遇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滞胀，经济大调整，产业转移。二战后美国开始向日本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随后亚洲四小龙抓住机遇，先后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由此开启了东亚经济奇迹的高速经济增长。尽管中国错过了这一极佳的经济起飞时间窗口，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牢牢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20 世纪 70 年代，美、日等发达国家在两次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开始着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东亚产业也将自身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其他国家。逐渐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开始积极融入到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凭借劳动力价格优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紧抓东亚产业转移契机，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经济初步起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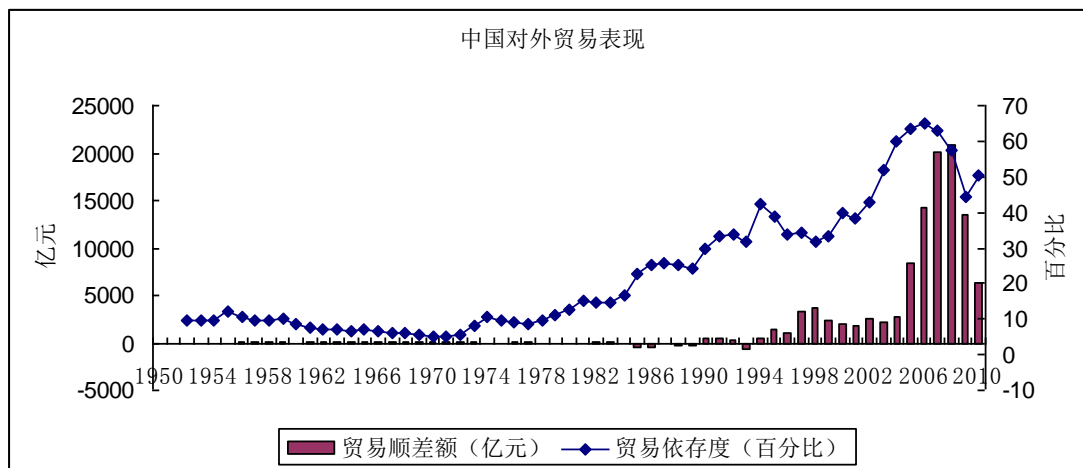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2009 年以前的数据来自《新中国 60 年统计汇编》全国篇，2009 和 2010 年数据来自《2011 中国统计摘要》。

图 16 中国利用外资表现

第二次机遇是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两阵营对峙结束，全球统一市场形成，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始。先后开放了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1984 年开放了广州、上海等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随后又开放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开放区，增设海南经济特区、设立上海浦东开发区，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对外开放的优惠政策和良好格局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到中国投资建厂，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现代化建设。1991 年外商直接投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1.1%，到 1994 年激增到相当于经济总量 6% 的规模，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日趋活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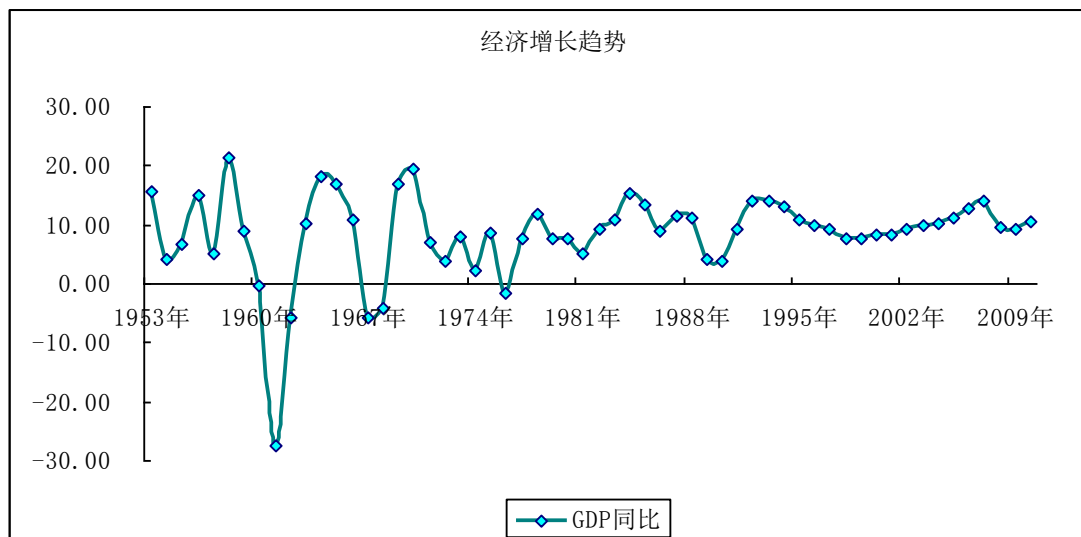
第三次机遇是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的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加快，中国逐渐成为亚洲、欧美、非洲、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放松了其他国家对中国低廉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限制，尽管时不时还是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贸易制裁，但是对外贸易有着突飞猛进的增长。911 事件后恐怖主义迫使大国加强合作，欧美空前团结，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紧密，中国获得了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称，发达经济体的许多企业把劳动力密集型甚至是高科技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大陆。广东、浙江、江苏的一些地方成为了世界磁头、机箱、敷铜板、驱动器、高级交流电容器等部件的世界生产基地之一。在亚洲，中国已成为继日本后最大的个人计算机生产基地。



数据来源：2009 年以前的数据来自《新中国 60 年统计汇编》全国篇，2009 和 2010 年数据来自《2011 中国统计摘要》。

图 17 中国对外贸易表现

从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已经基本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从 1953 年起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经历了 5 个经济周期。从图 13.16 中可以看到，在 5 个经济周期中有 3 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经济增长率都在 20%左右，每次“大落”经济增长率都很低，有两次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61 年的经济低谷经济增长率为-27%。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波动主要受政府计划左右，经济在浓重的政治背景中扩张收缩，导致经济波动大起大落。1978 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为计划经济时代剧烈的经济波动划上了句号。从经济数据的表现来看，改革开放后经济经历了 5 个周期。与计划经济时代相比，经济的波动幅度趋于缩小，经济周期也从“古典型”转型为“增长型”经济周期。古典型经济周期在经济衰退时表现为经济总体水平出现负增长，而增长型经济周期在经济衰退时仍是正增长，只是增长幅度下降，经济总量在增长。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经济波动大起大落，几个经济周期表现为古典型经济周期。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调控经济，经济增长仍然有所波动，但即使在经济周期的谷底，仍保持一定的速度在增长。



数据来源：2009 年以前的数据来自《新中国 60 年统计汇编》全国篇，2009 和 2010 年数据来自《2011 中国统计摘要》。

图 18 1953—2010 年中国经济增长趋势

今天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与世界经济的波动越来越趋同，其繁荣与衰退的特征与其他经济体越来越一致。作为资本和商品双输出双顺差国家，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主要经济大国需要加强沟通交流，了解彼此的需要和关切。世界需要习惯中国的崛起，中国也需要承担作为大国的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

五、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和中国经济的未来

“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这并不是说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将会崩溃，而是说它们将失去 500 年来的统治权。”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

当历史学家回顾我们所处的时代，可能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向中国的崛起那样引人注目。可是，当他们进一步放开历史视野时，他们将看到那不是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如今，中国可能正在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然而，昔日它曾经享此殊荣，那不过就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

——Angel Gurría^①

①引自 OECD 秘书长 Angel Gurría 为《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公元 960-2030》所作序言的开篇语。

在纪元的第一个千年，亚洲是世界经济重心，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总量分布，亚洲都占据超过世界一半的规模。从公元 1000 年左右开始的 700 年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古代中国的陶瓷和丝绸风靡全球。历史学家们说，到 1730 年时，中国的制成品产量还达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中国目前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约为 12%。尽管亚洲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的比重一直很大，但是从十七世纪起，世界经济重心就开始渐渐向西方转移。

表 6 公元 1-1000 年世界经济总量分布

	国家 GDP(百万 1990 年国际元)		占世界经济总量比例		年均复合增长率 1-1000
	公元 1 年	1000 年	公元 1 年	1000 年	
欧洲	17949	16365	17.0%	13.5%	-0.01%
西方后裔国	448	748	0.4%	0.6%	0.05%
拉丁美洲	2240	4560	2.1%	3.8%	0.07%
亚洲	76735	85815	72.8%	70.8%	0.01%
非洲	8030	13720	7.6%	11.3%	0.05%
全球	105402	121208	100.0%	100.0%	0.01%

注：在麦迪森的著作中，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称为“西方后裔国”。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6 AD (Copyright Angus Maddison)

表 7 公元 1-1000 年世界人口分布

	人口数(年中千人)		占世界总人口比例		年均复合增长率 1-1000
	公元 1 年	1000 年	公元 1 年	1000 年	
欧洲	33700	39160	14.9%	14.6%	0.02%
西方后裔国	1120	1870	0.5%	0.7%	0.05%
拉丁美洲	5600	11400	2.5%	4.3%	0.07%
亚洲	168400	182600	74.6%	68.3%	0.01%
非洲	17000	32300	7.5%	12.1%	0.06%
全球	225820	267330	100.0%	100.0%	0.02%

注：在麦迪森的著作中，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称为“西方后裔国”。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06 AD (Copyright Angus Maddison)

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世界航路的改变，荷兰的海外势力得到充分发展，荷兰成为第一个称雄世界的欧洲国家。在 18 世纪 60 年代，英国发起工业革命，生产技术水平得到跨越式提高，经济获得飞速发展，英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国家，确立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日不落帝国”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中心。

十九世纪以来，英国工业革命的先进技术逐渐传播到欧美的先进国家，其他西方国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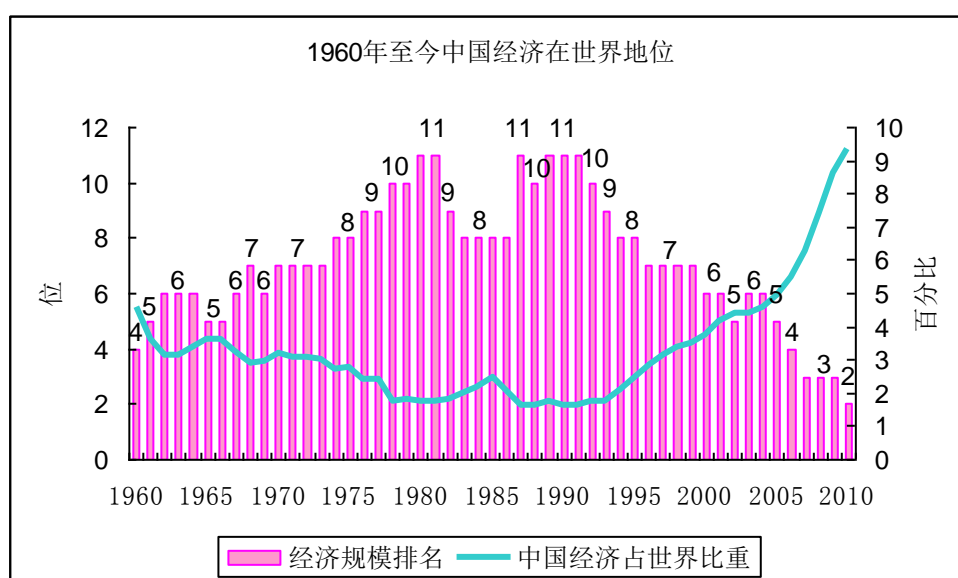
掀起了产业革命的浪潮，世界经济格局呈现群雄并起的局面。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经济中心已经开始从英国逐渐向美国转移，美国于 1894 年工业产值超过英国，跃居头号经济强国，美国经济规模开始了独步全球的纪元。

表 8 世界经济重心兴衰过程

发展阶段	I. 中国	II. 荷兰	III. 英国	IV. 美国
崛起	4 世纪~10 世纪	1575~1590	1789~1815	1897~1913/1920
兴盛	10 世纪~13 世纪	1590~1620	1815~1850	1913/1920~1945
成熟	14 世纪~15 世纪	1620~1650	1850~1873	1945~1967
衰落	15 世纪~16 世纪	1650~1672	1873~1897	1967~(?)

资料来源：部分改编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 1500-1990》7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二战之后，世界格局总体趋于稳定，欧洲复兴，美国独霸，德国和日本在废墟上再度崛起。计划经济三十年，虽然给中国经济打下了重化工业的基础，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之前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当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时候，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相继实现经济起飞，印度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实现快速崛起。中国的崛起并非特例，也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出现了持续的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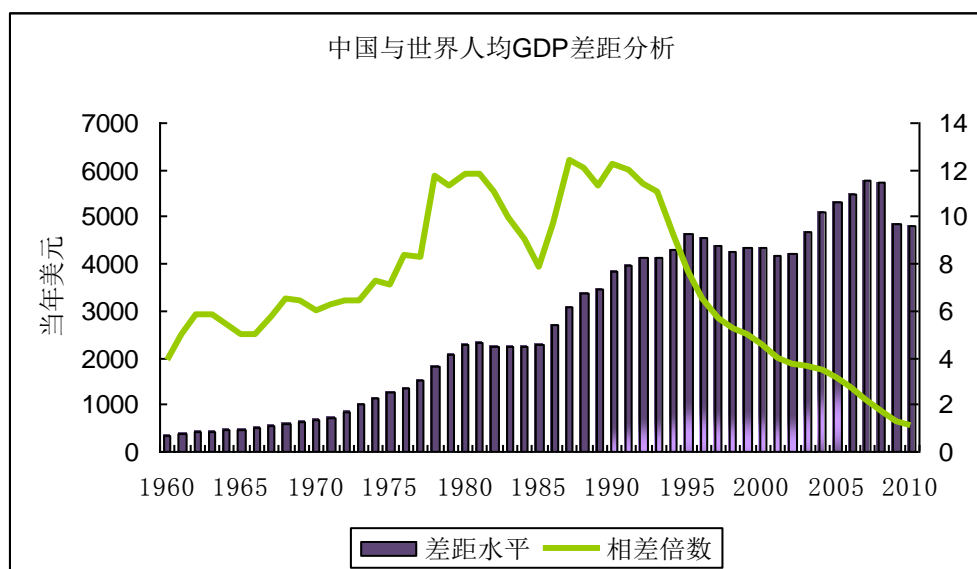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图 19 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变迁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经济史上最贫穷经济大国。中国的人均 GDP 与世界

富国相去甚远。即使中国的经济保持强劲增长并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但人均 GDP 水平也只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二十一世纪初期，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发展机遇期，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也是一个社会矛盾高发期，经济风险高发期。历史上，因为发展战略失误、社会问题以及外部冲击而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低迷的国家数不胜数。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图 20 中国与世界人均 GDP 差距分析

《金融帝国》的作者迈克尔·赫德森认为，1945-2010 年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以美元为中心的区域和非美元区的格局将被打破，未来世界体系的形成取决于旧有秩序是向哪个方向分化。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发生逆转，美国面临着经济衰退的风险，而欧洲经济停滞，还面临着债务风险，日本仍在沉睡，昔日引领全球经济的三大经济体自顾不暇，全世界都缺领导力，而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被寄予了厚望。中国能否力挽狂澜？

全球金融危机令全球化发生逆转。加入 WTO 是中国领导人做出的融入世界经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政治决定。此后，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结为重要贸易伙伴，成为了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年里，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在 60% 以上，贸易顺差额逐年攀升。金融危机来临后，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受到极大冲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环境不再宽松。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严重依赖出口，2010 年对外贸易依存度仍有 50%。而欧洲和美国分别是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出口地。不难想象，如果欧美深陷衰退难以自拔，中国制造就失去了最大的市场，势必难以独善其身。

全球化逆转，外需高速增长黄金年代已经过去，中国经济的传奇要延续下去，我们只能从对内改革着手。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把改革比作砍小狗的尾巴，渐进式改革是一节一节地砍，而“休克疗法”是一刀砍断。萨克斯等人主张要改革就必须完全推行市场经济，断绝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保留了小狗尾巴的一部分，剩下的部分可以一节

一节砍。经济学家陈志武则认为，先进行经济改革，让很多人尝到好处，然后等经济发展好了，再来进行政治改革，听起来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应该是很好的，但很遗憾的是，第一步也许是没问题的，但这个时候要再进行改革，动力远远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大了。杨小凯也在林毅夫提出“后发优势”时“不合时宜”地提出“后发劣势”问题，他认为，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模仿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在短期内可以取得很好的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会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会导致改革失败。不幸的是，今天的中国正在面临“后发劣势”。

尽管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也成为很多国家改革效仿的对象，“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成为国际论坛的热门词汇，中国人也曾一度沉浸在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之中。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近十年来，一些领域的改革几乎陷入停顿，有的则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当前，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经济社会变革的制度红利基本释放完毕，中国现在缺的是改革的动力，或者说形成改革动力的力量。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具备改革共识，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人心思变”的时代，每个社会阶层都在强调改革，也都认识到改革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真正出路。但是，各个阶层的共识是不一致的。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当下不觉被改革共识，因为一些强势阶层没有改革动力，并对一些领域的改革设置障碍。

如果不能没有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或者是重大的制度变革，中国的经济奇迹将难以为继。中国的改革之路已经到了需要从增量改革为主，存量改革为辅的阶段过渡到存量改革为主，增量改革为辅的阶段。所谓中国模式，是一个历史现象，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现象。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回归常规、常识，弱化特色、特例。只有在未来，中国模式的内涵才可能更加丰富。中国未来的发展源泉，在于继续推进经济的市场化，推动社会政策的广泛覆盖和公平正义，推动国家制度建设。

以德国为例，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由于资本在急剧发展扩大过程中，完全无视周围的环境，在工业和商业发展的中心，到处是失业、贫困、饥饿、流浪、乞讨、偷窃、恶劣的劳动和社会条件。当时非常突出的一个矛盾就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为生活所迫的工人们组织起来，除了实行有限的经济互助以外，还开展了争取权利的政治斗争。当时的资产阶级面临无产阶级革命不断的挑战。在这种时局下，德国很多学者深感问题的严重，他们既不赞成曼彻斯特派的自由放任主义，也不相信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可以解决问题。就社会政策在德国的产生而言，俾斯麦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对国家职能有了比较现代化的理念。他说，“国家不应该被认为是现存秩序的简单的守护人，现代国家的逐步进化要求国家应该不断完成其维护现存权利的使命，同时也应该通过适当制度的建立，积极主动地改善全体成员的福利。”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了德国，建立起了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同时首创了德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俾斯麦模式，俾斯麦之后的德国迅速崛起成为欧洲的强国。

回顾 19 世纪以来大国崛起的经济增长轨迹，正如金德尔伯格的发现，似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是有生命周期的，从经济起飞到经济发展阶段，再到经济的成熟，停滞甚至走向衰退。一般来说，大国的崛起都有其经济霸权尤其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的支撑，而每次经济的飞跃都有时间期限，最多持续二三十年高速增长。美国经历了两次高速增长期，一次是工业革命完成后 188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期，第二次是二战后到 60 年代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期，这两次持续高速增长均不过二三十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创造的“东亚奇迹”大约是 30 年左右，1990 年左右日本资产价格暴跌，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可能一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对外开放的“西风”已经转变风向，而对内改革的“春风”逐渐减弱，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新的“惊险的一跃”，还需要更加坚苦卓绝的探索。

从历史的长周期来看，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只是恢复到了 1913 年时在世界的经济地位，2010 年中国 GDP 占世界的 9.32%，麦迪森测算的 1913 年这个值为 8.83%。但麦迪森同样的测算方法在 1820 年，中国 GDP 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 32.9%。即使如 IMF 所预测的，按购买力平价方法测算，2016 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能达到 18%，与 1820 年经济规模占据世界三分之一的成绩相距甚远，中国的复兴之路仍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如果一切顺利，中国经济将有望在可预见的未来回归其在历史上曾经的辉煌，世界经济的重心也将再次转向东方。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希望世界经济重心完成自西向东的转移，也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完成书写新的历史的重任。